



西方文学与 海外华文文学论稿

高伟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文学与
海外华文文学论稿

高伟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论稿/高伟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203-1715-3

I. ①西… II. ①高…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413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熊 瑞
责任编辑 张 湑
责任校对 王 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282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西方古代文学

- 古希腊文学中智慧型英雄的受难原型 (3)
- 《俄狄浦斯王》与父权制伦理原型 (10)
- 古希腊神秘主义与唯灵主义 (18)

第二部分 西方启蒙主义文学

- 乌托邦与启蒙精神的矛盾运动及其当代性反思 (29)
- 欧洲启蒙运动与基督教文化 (40)
- 卢梭与道家精神 (51)

第三部分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

- 英国浪漫主义的有机论美学观 (63)
- 威廉·布莱克诗歌中的宗教神话及其现代价值 (77)
- 济慈诗歌中的希腊意象 (87)
- 雪莱诗歌创作中的希腊意象 (99)
- 德国浪漫主义者的神圣道说 (109)

第四部分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宗教回归倾向 (121)
-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时间意识 (134)
- 试论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文学观念 (146)
- 科技时代的写作
- 从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谈起 (155)
- 尼采对古希腊生命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166)
- 弗洛伊德与古希腊文学传统 (177)
- 萨特的戏剧创作与古希腊传统 (187)

第五部分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翻译

- 试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国家意识 (197)
-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重构及其启示 (208)
-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绅士观念(绪论部分) (218)
- 浪漫主义的希腊主义 (233)

第六部分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 华人资本主义在泰国 (259)
- 中华传统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承与变异 (271)
- 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与东南亚华人经济 (281)
- 泰华文学与泰国华人的身份认同 (290)
- 泰华作家亦文亦商现象探析 (299)
- 后记 (306)

第一部分

西方古代文学

古希腊文学中智慧型英雄的受难原型

古希腊神话是古希腊文学的土壤，它通过隐喻性的方式表达的各种欲望和幻想，成为古希腊诗人反复吟唱的文学原型。我们从古希腊文学的各种范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对智慧型英雄的反复思考与领悟。虽然诗人们由衷地崇尚和赞美智慧型英雄的各种品质和力量，但他们也深深地认识到智慧的双重性给英雄造成的无端厄运和苦难。由于这种对苦难的意识启发了诗人们心灵深处的悲伤与隐痛，从而使他们创造出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悲剧形象。

一 普罗米修斯原型

在人类要求摆脱愚昧、不断向着自我解放的精神历程中，古希腊人展现了人类童年时期最为辉煌的一页，他们在与自然和社会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具有强烈人本意识的价值理念。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它既表达出古希腊人在与自然分离的过程中要求摆脱自然力控制的个体意识，又表达了古希腊人在掠夺财富、发动战争和建立父权制为主体的国家制度过程中所体现的自由意识。然而，古希腊人清醒地意识到，要成为自然的主宰和社会生活中的英雄，除了要有过人的体力和勇敢的精神外，最主要的还是要有高超的智慧。在古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就是作为智慧的人格化身而受到古希腊人的崇敬的。她是智慧、勇敢和技艺之女神，她善于思索，勇于战斗；她既是一个活泼的少女的形象，又代表

了希腊神统中国家秩序的正统观念，在个性精神方面崇尚节制、谨慎，同时又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她由于高超的智慧和勇于战斗的作风赢得了古希腊人的普遍尊敬。

然而，雅典娜代表的是古希腊民族正统的神意，她体现的是希腊民族的个性精神和民族意志。古希腊神话中除了代表着民族正统的神意外，还存在着一种被压抑的神意，这种神意就是以普罗米修斯为代表的为了人类的幸福而殉道的受难者形象。由于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与古希腊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他的思想行为体现了古希腊神统中对被统治人群的深切关怀，因而更加受到古希腊人民的普遍崇敬，在古希腊人对智慧问题的思考中成了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形象。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奥林匹斯神统中的异端，他作为神界的智慧型英雄，其主要的精力不是在关注神界的事业，而是始终关注着人类的命运和幸福。普罗米修斯不仅是人类的创造者，人类文明的推进者，还是人类技艺的导师。但是，这位造福于人类的神祇却触犯了宙斯的神意，宙斯给普罗米修斯以神界最严厉的惩罚，让他日复一日地被巨鹰叼啄内脏，承受无数次死亡的巨大痛苦。这是人类智慧所能设想的最大苦难。我们知道，凡人只能经受一次死亡，而普罗米修斯却经历了无数次死亡，这表明普罗米修斯对宙斯所施加的死亡惩罚予以冷漠的蔑视。普罗米修斯把最大的苦难当成自己的命运来承受，从而超越了死亡对他的限定。更为重要的是，在他忍受的巨大痛苦中，在他对苦难所施与的蔑视中，却焕发出了一种奇异的精神生命，“精神生命不是逃避死亡，回避毁灭的生命，它忍受死亡并在死亡中忍受自己的存在。只是当他发现自己被撕得粉碎时，它才赢得自己的真谛。它之所以是伟大的力量，不是凭着它是一种逃避否定的肯定……相反，精神之所以是这种力量，完全是因为它勇于面对否定，跟着与否定居住，在否定旁边的这种居住正是将否定转化为存在的魔力”^①。黑格尔的这种魔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悲剧力量，而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性不仅表现在他勇敢地承受了宙斯给他

^①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3页。

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他在受难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精神生命，它激发起古希腊人对智慧本质的双重性的深沉思索，因而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惩罚是古希腊人以文学的形式对人类智慧本身的一种警告。与此同时，普罗米修斯凭靠其天神的智慧创造人类并为人类谋幸福的举动是没有违反任何神意的，他遭受惩罚是由于他违反了神圣的统治秩序，由于他的智慧所表现出来的对最高神意的不尊。因此，普罗米修斯虽遭到宙斯的严厉惩罚，但他的受难却显示出了一种巨大的悲剧力量，强烈地震撼了古希腊人的心灵，从而使古希腊人对这位神圣的受难者和殉道者产生由衷的敬意。

二 奥德修斯原型

奥德修斯是荷马史诗中智慧型英雄的典型，他在希腊联军中以足智多谋著称。虽然奥德修斯和其他英雄一样具备武艺高超、勇敢顽强、富有责任感等英雄品格，但他更多的是以智慧取胜。从荷马史诗来看，诗人对智慧型英雄的崇拜要更甚于对勇武型英雄的崇拜。勇武型英雄阿喀琉斯虽然有强壮的体魄、高超的武艺和勇敢的精神等优秀品德和个人魅力，但他也有任性、不顾集体利益等缺点，造成希腊军队的巨大损失。而智慧型英雄奥德修斯更多的是凭借他的智慧来取得勇武型英雄所不能取代的功绩，在希腊联军处于危急时刻时，是他用智慧挽救了希腊军队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奥德修斯的智慧才最终使古希腊人攻下特洛伊城，获得特洛伊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任何凭武艺和勇敢所不能创造的英雄业绩。因此，智慧在古希腊人的心中具有更为崇高和神圣的地位。

然而，古希腊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度感的民族，诗人荷马并没有因为智慧的业绩而忘却了对它的深度思考。虽然智慧是人类摆脱愚昧和野蛮、朝向文明大道迈进的必备条件，但它同时也是人类罪恶的根源。尼采也说：“智慧，尤其是狄奥尼索斯智慧，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罪行，并且告诉我们，任何人如果借着知识上的自负而把自然投入深渊的话，他自己也必将尝到自然分裂的苦果。”人类智慧一方面在建造文明，另一

方面又给文明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智慧在受到文明赞美的同时也受到了诅咒。荷马的这种对智慧本性的思考已超出了他对智慧型英雄品质的诠释，从而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了智慧所造成的细微而又深刻的痛苦。荷马并不总是把智慧型英雄描述成积极的、乐观向上的正面英雄形象，而更多地意识到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制约，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把人类引向一个充满未知数的两难困境。这种对苦难的意识启发了荷马内心深处的悲伤与隐痛，使他创造出了英雄奥德修斯震撼人心的苦难与荣誉相交织的交响曲。

古希腊人对神意是尊崇的，他们听从神的召唤，顺从命运的安排，但是在具有智慧的人身上，他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违反了神意安排，这种人与神意的冲突，正是古希腊英雄陷入悲剧命运的根源。奥德修斯作为人世间的智慧型英雄，他以其高超的智慧使希腊联军攻下了特洛伊城，使希腊联军得以凯旋，但最高神祇宙斯却赋予他海上漂流十年的惩罚，这种惩罚与其说是法律意义上的惩罚，不如说是最高神意对智慧本身的惩罚，因为最高神祇在特洛伊战争开始时就已经决定了这场战争的命运——希腊人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宙斯之所以要惩罚奥德修斯，并不是因为奥德修斯违反了神意，也不是因为他冒犯了天尊，而是对人类智慧所造成的灾难的惩罚，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用智慧取得胜利的同时，对特洛伊人来说却是智慧制造的一场灾难，所以他理应受到最高神意的惩罚，这种惩罚在神意方面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对人类的关爱。

因此，荷马并没有因为智慧所造成的灾难而对智慧本身产生仇视。奥德修斯虽然因遭天神宙斯的惩罚而受难，但他的受难并不是一种因罪行而遭受的苦难，而是一种智慧型受难，是有高超智慧的人所必须承受的一种苦难。因此，受难对有智慧的人来说并不是他必须逃避的命运，而是人生应该经历的考验，唯有经受这种考验，智慧才有可能朝向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十年虽然是宙斯给予他的惩罚，但他把它作为一种智慧的历练，这样，他在海上和回家途中依靠自己的智慧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就不是一个受惩罚的过程，而是一个经受各种苦难而演变成对智慧型英雄进行考验的过程。从阿加门农被其

妻子及情人所杀的情节来看，我们相信，奥德修斯通过智慧的受难回到故乡伊塔卡所获得的幸福要比其他凯旋的希腊英雄强烈得多，因为他的幸福是在受难过程中得到的，因而更显得弥足珍贵。奥德修斯在文学上的原型意义就在于，他以智慧的大脑和果敢无畏的行动使他的受难与荣誉在最高神祇宙斯的天平上获得了微妙平衡。

三 俄狄浦斯原型

智慧型英雄的受难在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俄狄浦斯是古希腊社会成熟时期智慧型英雄的代表，他是忒拜国伟大、英明、富有责任感的君主，“无所不晓的人”、“最高贵的人”，他拥有最高权力和可以与天神相媲美的智慧，然而他却在毫无犯罪动机、毫无过错的情况下犯下了人类社会最大的罪行，这种罪行是人的智慧所无法认定和把持的。从俄狄浦斯的行为来看，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为忒拜人谋求幸福，但是，当俄狄浦斯勇往直前，力排众议，一直走到这条自己闯出的道路尽头时，他才发现，他自始至终都是被自己所玩弄，俄狄浦斯就像是无端的厄运降临在他身上一样，他无法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自由意志去战胜或摆脱这可怕的命运。这位具有天神般智慧和高贵的君王由此犯下了人间最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在神的眼里成了一个最卑贱、最为人类所不容的人。他由此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为的是此后不再看见自己所造成的罪恶，并主动要求放逐异乡。直到此时，俄狄浦斯才真正认识到命运的巨大威力。当命运的这种不可逆转的必然性呈现在他面前时，俄狄浦斯由智慧所开创的自由意志也走到了终点。诗人以歌队长的独白总结道：“忒拜本邦的居民啊，请看，这就是俄狄浦斯，他道破了那著名的谜语，成为最伟大的人；哪一位公民不曾带着羡慕的目光注视他的好运？他现在却落到可怕的灾难的波浪中了！因此，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時候，不要说一个凡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① 俄狄浦斯命运的悲剧性就在于无

^① [希]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外国剧选》（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117页。

论人具有多么高超的智慧，他都无法与神秘莫测的命运相对抗，智慧虽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天然禀赋，但在强大而神秘莫测的命运面前，人类的智慧又显得那么渺小。

索福克勒斯虽然认识到这种神秘命运的存在，但他只有关于命运的朦胧意识，缺乏对命运的明确的理性观念。然而，诗人在对俄狄浦斯命运的玩味中，启发了古希腊人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感。俄狄浦斯通过对罪行的自我认定，以忏悔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不可知命运的尊敬，从而获得了神的重新肯定。“然而，这位深刻的诗人告诉我们，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是不可能犯有罪恶的，虽然他的行为破坏了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自然秩序，也就是整个伦理规范。但是，所有这些行为，将创造意义更为丰富的结果，而这结果就是从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世界。”^①从人类精神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尼采所说的新世界就是古希腊人的智慧所不能企及的信仰世界，因为智慧所及的范围是有限的现象世界，在智慧所不能及的范围之外，只能依靠信仰才能达成，俄狄浦斯的忏悔揭示了智慧型英雄受难的新形式。在这种受难形式中，英雄行动的意义在更高一个层面上被否定了，因为英雄的智慧无法确证这本体的世界的存在，他只能顺从这本体世界中发出的命运安排，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英雄的受难并不是肉体的或个体的受难，而是精神性或普遍性的受难。通过俄狄浦斯的忏悔式受难，智慧英雄在现实行动中的罪行被最高神祇宽恕，并在神界重新获得肯定和赞美。这是古希腊诗人对智慧型英雄受难历程的探索而得出的最后结论，这个结论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以注重信仰为主体的新世界的诞生。

四 结语

古希腊人是一个爱智慧的民族，他们的哲学研究就是运用智慧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进行的探索。古希腊诗人同样也秉承了这个民族的风尚，他们对智慧型英雄受难的思考和领悟贯穿了整个古希腊文学的发展进

^① [德] 尼采：《悲剧的诞生》，刘崎译，作家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1 页。

程，因而它是古希腊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原型意象，荣格曾经指出：“原型是领悟的典型范式，每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打交道。”^① 虽然这种思考和领悟带有古希腊人那种特有的童年时期所表现的精神气质，但从他们对真理所表现的执着追寻中，可以看到他们天真的思想中蕴含着凝重，感性中蕴含着理性，充满想象却蕴含着哲理。古希腊社会缺少东方民族那种唯灵主义气质，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对现实性和世俗性的关怀，用人类智慧本身的力量来认识和诠释自然与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奥秘，虽然他们的探索无法达到本体世界，但他们从现象界的各种表现中领悟到了古希腊思想中存在的本体性缺陷，而古希腊诗人对智慧型英雄的领悟正是这种本体性缺陷的外在表征，诗人们反复咏唱着智慧型英雄的受难，并通过这种受难而产生的震撼和净化作用引发人们对古希腊民族的这种本体性缺陷的反思。诗人们对智慧型英雄受难问题的深沉思考，使得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思想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为古希腊的人本主义与基督教的唯灵主义融合搭起了一座精神上的桥梁，为两种异质文化在罗马社会末期的交融提供了精神基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督教世界能够比较顺利地与古希腊、罗马社会实现融合，跟古希腊诗人对智慧型英雄受难的深沉思索是分不开的。

^① 参见冯川等编译《心理学与文学》一书的“译者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页。

《俄狄浦斯王》与父权制伦理原型

母权制社会伦理是古希腊社会早期形成的基本伦理规范和社会结构运行的基本理念。在这个自足的伦理实体中，它有着安定的组织、平稳的运动与和谐的节奏。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变化，这种自足的伦理秩序逐渐遭到破坏，继之发生激烈的社会转型。古希腊社会就发生过母权伦理被父权伦理取代的社会转型，恩格斯也说过：“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妇女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此后，以宙斯为最高神统的父权制伦理秩序统治着希腊各城邦。虽然，“父权制的伦理意识本质上是直接趋向法律或法权发展的”，但古希腊各城邦当时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因而各城邦国家虽然都建立了相对发达的父权制民主制度，但由于当时父权制民主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使得人们对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普遍的怀疑。这种情绪自然会使古希腊人萌生一种企图恢复古老的母权制社会的愿望，但父权制取代母权制，毕竟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面对这种互相敌对的伦理冲突，索福克勒斯密切关注着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命运，《俄狄浦斯王》便是他对这一社会重大转型时期伦理关系的细致而深刻思考的结晶，他在这里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了几种最基本的父权伦理观念，从而为社会转型期间的生命个体适应这种变化提供了心理转换的基本原型。

伦理原型之一：法权观念

雅典是古希腊最为发达的城邦制国家，但雅典这个“高度发达的

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①，因而在国家法律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父权伦理并不足以对曾经长期存在的母权伦理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制约，一旦城邦出现矛盾纷争，人民就会对这种新出现的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转而去求助于过去曾长期统治社会的母权伦理。母权制以母系血缘为关系纽带组织和规范氏族部落，这种制度主要依靠血缘关系来统治，其自身也有很高的民主形式，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雅典城邦民主制度陷入危机时期，索福克勒斯清楚地意识到法权观念的脆弱。于是，在《俄狄浦斯王》中，作者便以对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罪行的先行论定，表现出作者对法权观念至高无上地位的强烈关注。而在母权制社会里，杀父娶母是没有罪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允许存在的。古希腊神话中的地母盖亚既是乌拉诺斯的母亲，又是他的妻子。乌拉诺斯仇恨自己的子女，盖亚就联合自己的子女反抗丈夫，其子克洛诺斯就是通过与母亲的联盟建立起第二代神统的。这则神话典型地反映了母权制社会中的伦理现实，索福克勒斯对俄狄浦斯罪行的先行论定，意在表明母权制社会依靠母子血缘建立起来的联盟无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反而会造成无休止的仇恨和杀戮，严重损害了种族的繁衍和社会的和谐。因此，杀父娶母之所以是严重的罪行，不仅因为它是母权制度下的一种伦理现实，而且严重违背了人的自然天性，并且与人类崇高的法权相违背。

就俄狄浦斯来说，杀父娶母并非是由俄狄浦斯的行为所致，而恰恰是由其父拉伊俄斯造成的。传说拉伊俄斯在年轻时被迫逃离本国，投靠佩洛普斯国王，受到国王的热情款待。但拉伊俄斯却以怨报德，在涅赛亚赛会时劫去佩洛普斯的儿子克勒西波斯，于是，众神决定对拉伊俄斯进行惩罚：他将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他的王后将成为儿子的妻子。父亲造就的罪恶却要儿子来承担，这不仅对儿子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它也不能作为俄狄浦斯法律意义上罪行的证据，因为当拉伊俄斯得罪神意而受罚时，俄狄浦斯还没有出生。此外，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并非出于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本意，他离开科任托斯正是要逃离杀父娶母的命运，他在逃往忒拜的路上杀死一个老人是出于正当防卫，他娶忒拜寡后为妻是由于她的智慧而得到的荣誉，他的动机和行动都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罪行。然而，俄狄浦斯“在决意行动时，行为者所昭然明了的一般只是决意的一个方面。但是，决意自在地是一种否定物，因为他本身虽然是有明白认识的，却有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异己的、陌生的东西同自己对立着。因此，现实总是隐藏着认识以外的不正当的那一面，不把自己按照其自在自为的本来面目呈现于意识之前，不让儿子意识到他所杀的那个冒犯者即是他的父亲，不让她知道他娶为妻子的那位皇后即是他的母亲”^①。俄狄浦斯并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然而神意却在他完成行动之后显示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使行动的意义陡然间朝相反的方向转化，杀父娶母的命运得到应验，俄狄浦斯一下子由高贵的人变为令人所不齿的人，一个犯下人类最大罪行的人。这种转换与其说是俄狄浦斯行动的结果，倒不如说命运本身就是一个有罪行的环节。正因为杀父娶母是命运强加给俄狄浦斯的，俄狄浦斯就不应该为这桩罪行承担任何责任，然而，命运正是以它的这种不合理和强蛮显示了其威严和力量，俄狄浦斯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强大，尽管他也认识到这种命运的不公正，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屈服，授受了这桩罪行。

实际上，笼罩在俄狄浦斯头上的命运就是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必然性。作为具体承受这一命运的生命个体，俄狄浦斯自然不可能知道他要承受父权制强行施予他的巨大伦理压力，他仅仅是做了历史车轮下的一个无辜牺牲品。因而无论俄狄浦斯怎样有智慧，怎样去逃避、反抗命运给他的惩罚，他都未能摆脱父权制的必然性对他个人悲剧的先行裁定。父权制就是这样通过对俄狄浦斯的惩罚和俄狄浦斯对罪行的自我认定，宣泄着对母权制时代杀父娶母的恐惧，并用俄狄浦斯的巨大伦理罪状宣告了母权制的寿终正寝。

^①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页。